

国家形象与国际交往刍议

董青岭

内容提要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国家形象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通常,国家形象在两种分析向度上被定义,即现代性向度上的物质形象和情感向度上的道义形象。与物质形象相比,国家的道义形象更显其软权力的意涵。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物,有关国家形象的话语论说与国家权力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关系,并对国家间关系发挥着不容忽视的潜在影响。

关键词 国家形象 国家权力

现实主义相信,“唯有强权方可实现对外政策目标”。^①然而,自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世界形势的缓和和全球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传统的权力政治思维日渐为人们所怀疑。越来越多的国际事件表明,“强者为其所能,弱者受其所受”已不再符合时代潮流,即使是世界上物质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不顾及其他国家的意愿和反应而为所欲为了。一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及其结果,已经不再仅仅是由该国如何看待和对待世界来决定,同时也是由世界如何看待和对待它所决定的,一国内外行为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体系中他国认知体系的影响,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未像今天这样得到彰显。为寻求更大的国际发展空间,最大限度地增进本国利益,改善和提升国家形象已经成为新的国际共识。

一、国家形象:两种分析向度

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形象问题的凸现虽是近来的事,但有关国家形象的研究

• 董青岭,外交学院 2006 级博士生。(邮编:100037)

①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8 页。

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早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西方经典现实主义的大师们就已对此展开了相关的研究,譬如爱德华·卡尔对国际关系中道德和舆论的关注,汉斯·摩根索对“国家威望”的专门阐述。^① 80 年代末,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学说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家形象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纳入研究视域,就连当前蜚声国际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倡导者约翰·米尔斯海默也予以关注,认为“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就是“赢得民心”,“是相互依存时代重要的国家利益所在”。^②

那么,何为国家形象?简言之,国家形象就是外部公众对一国情况的总体认知和总体评价。通常,它在两个评价向度上被定义:现代性向度上的物质形象和情感向度上的道义形象。

就现代性向度而言,人们习惯于在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发达与贫穷、强大与弱小、繁荣与凋敝等二元对立坐标中来描述一国的形象特征,倾向于将形象理解为“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留下的主观映像”,^③“是人脑对所观察事物的再现”。^④ 具体地说,国家形象就是指“国家的客观状态在公众舆论中的投影”,^⑤是“外部和内部公众对某国的总体判断和社会评价”,^⑥是“一国政体、外交、内政、领导人、官员、人民、文化、历史等诸方面的综合形象”。^⑦ 这种主客体二元分立的定义充分体现了国际关系中物质主义的研究路径,它深刻揭示了国家形象赖以承载的物质基础,但也存在着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方面,它隐喻国家形象就是国家客观现状的真实反映,国家形象概念与国家现实之间是一种真实的一一对应的指涉关系;另一方面,它隐喻国家形象主要是对一国军事、经济、科技等物质性实力的反映和评价,认为国家形象的意义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的进步程度上,在逻辑上陷入了这样一种假象:国家的物质性实力越强,国家形象就越高大;如果国家的客观现实本身是好的,那么,作为其反映物的国家形象也应是好的。

而就情感向度而言,它并不否认国家形象的存在必须基于一定的物质基础,但它更注重国家形象在一定文化意义系统中的含义,以及蕴涵于其中的道德价值和情感判断。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单纯的客观物质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一定的含义系统确定行为体对周围的物质环境做出一定的反应和理解,“对于人类的行为

① 可参见:E.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3rd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7, pp. 36—70.

②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Pacifier”,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5, 2001, pp. 46—61.

③ 徐国定:《形象学》,香港:香港国际海洋出版社 1998 版,第 26 页。

④ 姜源:《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社会科学研究》2005 年第 2 期,第 89 页。

⑤ 刘小燕:《关于媒体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002 年第 2 期,第 61 页。

⑥ 汤光鸿:《论国家形象》,《国际问题研究》2004 年第 4 期,第 18 页。

⑦ 傅新:《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形象——兼对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的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04 年第 4 期,第 13 页。

来讲,只有通过共享的知识结构,物质资源才被赋予含义”。^①也就是说,某一特定国家的形象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被理解的。面对同一国家的客观现实,不同的文化意义系统会描述出不同的国家形象。同是一个物质实力超强的美国,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形象会截然不同于英法等国的描述。在这里,物质实力的含义在国家之间社会建构的认同关系中体现出来。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并非是由该国的客观现状所决定的,也不是由该国的自我宣示所决定的,它必须得到国际社会他者的认可和承认,而这种认可和承认又深深植根于认知主体所置身其中的文化知识结构或曰共享的意义符号系统。换言之,社会公众对一国形象的评价受其头脑中固有知识积淀的影响,而这种知识积淀则源于历史上和现实中国家间的互动实践过程。

以文化建构主义作为分析视角,国家形象与国家的客观现实并非一一对应,即使国家的客观现实是好的,但并不能保证它在国际上一定能获得好的形象评价,当然国家的物质实力强,更不能说明它在他国心目中的形象就好。所谓国家形象是指在国际交往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国客观概貌(包括国家的行为表现、精神气质、客观性状)在外部他者(包括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文化语境中的图景再现,或者说是,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基于某种文化意义系统使用语言、文字、符号等对某一特定国家的客观概貌所进行的话语描述和话语建构,这一话语描述和话语建构形成于国家间的交往互动实践过程,渗透了评价主体对于评价客体的道德情感和价值判断,反映了国家自我与他者之间相互的身份认同关系。简言之,国家形象概念所描述的是国际关系领域内“他是谁”的问题,通过确定“他是谁”,进而也就相应确定了“我是谁”,即自我身份和利益。因此,国家形象概念是一个主体间概念,反映了国家间的相互建构关系。从本质上讲,国家形象不是由国家自生的,而是由国家间的互动过程建构的,它只存在于一定的意义符号系统之中。

二、国家形象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意义

国家形象,是一个与国家间相互交往相伴而生的课题。很久以前,人们就已经注意到国家形象在国际关系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只不过这些有关国家形象的分析,大都与“国家声誉”、“国家威望”、“国家荣誉”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早在古希腊时期,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曾精彩地论述过国家声誉给雅典人与米兰人之间的战争所带来的影响。^②民族国家出现以前,国家形象不恰当地被等同于“君主的尊严、荣耀与王朝利益”,时常成为王朝战争与王朝冲突的导火线。在现代国际社

^① 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1995, p. 73. 转引自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 224 页。

^②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册),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第 26—62 页。

会,国家形象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托马斯·谢林指出,“声誉是国家值得为之而战的为数不多的因素之一。”^①即使是在权力政治主宰国际关系的时代,汉斯·摩根索仍不忘强调国家声望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只不过他所谓的国家声望主要是指国家的对外政治威望,主要来自被他国认可或意识到的军备优势,或者说是在他国心目中的实力——“实力名声”。^②这显然与第一向度上的形象分析相吻合,而本文认为将国家形象定义在第二向度上,即国家形象是一种国家间相互建构的文化产物,则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分析价值。

(一) 国家形象是国家对外决策无法回避的背景因素

观念影响行为。特定的价值体系在国家形象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文化价值结构的“刻刀”下也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国家形象。建构主义认为,国家间存在着三种性质不同的体系文化,^③在这三种体系文化下国家往往会相互建构不同性质的国家形象。具体地讲,在相互敌对的霍布斯文化下,国家倾向于相互建构敌人的形象;在相互竞争的洛克文化下,国家倾向于相互建构对手的形象;在相互友好的康德文化下,国家倾向于相互建构朋友的形象。这种象征性的国家形象一旦经一国舆论的宣传为该国公众所内化,就会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国家共识或国家偏见,作为一种背景因素长期左右该国领导人的决策思维和具体的对外政策,从而潜在地影响国家间关系。

现代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在国际信息的传播中,一国对另一国的信息报道并非总是真实的,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信息首先要经过本国价值体系的过滤和筛选,然后根据本国的现实政治需要进行选择性报道,从而随心所欲地在本国公众中建构起符合其意愿的他国形象,以获取公众对政府当前政策的支持;而他国一旦受到这些政策影响,往往会采取类似的行动。如此这般,两国在互动中建构了彼此的相互形象。尽管这些形象并非他国现实的真实反映,但它符合该国的价值传统和政治需要。这种被建构出来的国家形象强烈地渗透着一国的好恶,而这种好恶感很容易进入国家的决策层面,成为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

罗伯特·杰维斯指出,“如果不考虑决策者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别人持有的形象,那常常是无法解释至关重要的决定和决策的”。^④因此,“外交决策研究

①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

②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5, pp. 87—95. 转引自李智:《论文化外交对国家国际威望树立的作用》,《学术探索》2004 年第 10 期,第 90 页。

③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23—383 页。

④ [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 页。

必须置于国家形象的更广阔背景下进行。国家领导人、社会精英以及普通大众所持有的他国形象可能不会导致外交政策的具体结果,但它们确实会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长期方向或环境,理解国家形象的形成及其变化有助于正确评估国际合作与冲突的深刻根源。”^①

(二) 国家形象是软国力的重要表现形式

权力历来是国际政治分析的核心概念。约瑟夫·奈认为,权力是影响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能力,它包括硬权力和软权力两个部分。其中硬权力是指经济和军事权力,主要通过强制或利诱改变对方行为;而软权力作为权力的“第二张面孔”,则主要通过文化、价值观的吸引力影响别国的政治选择偏好。软权力有三个来源:一是文化,当一国文化包含普世价值观且政策是促进别国所共有的价值观和利益时,其获得理想结果的可能性增大;二是政治价值观,指在国内实现民主、在国际机制中与别国合作、在外交上促进人权与和平的价值观;三是被认为合法和拥有道德权威的对外政策。^②

显然,情感向度上定义的国家形象,其本质是一种基于道义的“软权力”,是一国在他国心目中所获得的道德评价和情感认知的总和,是一国在文化心理上对另一国所产生的权力影响。换言之,国家形象是一种国格魅力,它不是一种基于物质性实力威压对方屈服的强制力,而是一种诱导性的、向内吸纳式的吸引力,^③即能够让别人自愿做你想让他做的事情的道义感染力。对任何国家而言,树立正面的国家形象,有助于劝服他国接受和追随其外交谋略,引导他国沿着与本国利益相契合的方向发展,从而使一个国家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实现自己的预期目标。反之,一旦被树立起负面的国家形象,将极大地影响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参与程度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能力。

伊拉克战争及围绕战争所引发的一系列丑闻,重创了美国的国家形象,在相当的程度上削弱了美国霸权实力的合法性和道义性,在阿拉伯世界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反美浪潮,使得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和行为连连受阻,预期利益迟迟无法实现。与之相反,利比亚近年来则通过重塑国家形象,不仅得以重返国际社会,而且还有效地扩展了自身的国际权力,实实在在地增进了国家利益。2004 年 4 月 27 日,卡扎菲 15 年来首次正式访问欧洲,表示愿以积极态度对待中东地区的民主改革,美英等国不仅带头恢复与利比亚的关系,而且还暗示将积极考虑启动与利比亚在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和旅游等领域的合作。

^① Herbert Kelman and A. H. Bloom, "Assumptive Frame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J. N. Knutson,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73, p. 263.

^② 杨文静:《重塑信息时代美国的软权力——〈软权力:在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介评》,《现代国际关系》2004 年第 8 期,第 61 页。

^③ Joseph Nye,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Fall 1990, p. 166.

(三) 国家形象是国家间权力与利益博弈的重要手段

米歇尔·福柯有一句经典名言：“话语即权力。”^①就国家形象而言，谁掌握了国家形象的话语制造权，谁就掌握了国际权力斗争的制高点。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带来丰厚的国际回报，而不良的国家形象则会招致外部世界的惩罚。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被提升到各国的国家战略高度。然而，一国正面形象的树立并不仅仅取决于本国的美好愿望和自我克制，国家形象形成于国家间的社会互动，除了受一定文化意义系统的影响制约外，国家间不同的信息传播能力和话语建构能力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国家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虚构的、被想象的，是一种话语建构，即本国自我话语描述和他国话语描述相互博弈的结果。正因如此，国家形象越来越被国家用作权力博弈的工具。也就是说，一个在文化上和物质上强大、信息技术发达的国家拥有本国和他国形象的话语制造权，而一个在文化上和物质上弱小、信息传播技术落后的国家则常常被淹没在强势话语中，其形象往往被他国所建构，并成为他国谋取和实现利益的牺牲品。

诚如福柯所揭示的那样：“权力作为社会地位、政治权势和经济利益等构成知识生产的主体、背景和氛围之类的东西，形成了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网络，深刻地制约乃至决定着知识的性质和用途……而所有的知识，其目的都在于确证权力关系所代表的社会统治结构和秩序的合法性。正所谓权力制造知识，知识建构权力，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加强的关系。”“人们必须借助话语建构自己的身份，并在特定的话语系统里把自我表达出来，为他人所理解。而人们所言说的话、所书写的文本中无不蕴含着某种权力关系，因而，掌握话语言说权和文本书写权的人把世界描述、解释和规范成什么样子，世界就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掌握了话语权就掌握了世界。”^②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国家形象的建构。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形象的话语制造权总是掌控在那些物质和文化实力强大的信息传播大国手中，它们不仅凭借强大的话语霸权言说着自己的形象，而且还言说着他国的形象，反过来，这些形象言说又加强了这些国家的话语霸权，确证这些国家享有权力优势、进行权力统治的现实性和合法性。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美国如何利用自己的强势话语塑造自己“人权卫士”的形象，并“妖魔化”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形象就可以知道了。

三、改善和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

透过上述分析，国家形象建设对于中国立足国际舞台的重要意义已经不言而

^①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 p. 27. 转引自李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思潮》，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9—110 页。

^②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p. 27.

喻。每个国家都应当谨记摩根索的告诫：“在争夺生存与权力的斗争中，他人对我们的观点、看法同我们的实际情形一样重要。正是我们在他人‘心镜’中的形象——哪怕这镜中之像是歪曲的反映，而不是我们原本的样子，决定了我们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①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不再仅仅是一个道义概念，它越来越包含权力的意义，并成为国家谋取和实现本国利益的有力工具。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已成为一个国家在相互依存时代安身立命的必然选择。

国家形象作为一种观念知识结构，在短时期内极不容易建立，但一经建立就极难改变。要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我们必须综合运用建构和解构两种战略，做好“破”与“立”两方面的工作。

所谓建构战略，主要是通过发展、沟通、认同、克制等各个方面的努力积极主动地建构正面的中国形象。发展是指“打铁先要自身硬”。国家形象并非一国的真实反映，但它又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虚幻存在。一个经济上不能增进人民福利、政治上动荡不安、文化上衰败停滞的国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好的外部评价的。中国要大力发展自己，要通过发展改变自己，也改变外部世界对我们的看法。沟通是指要全面加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合作与互动，从政府到民间、从精英人物到一般社会公众、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教育科技文化各领域，尽可能地增进相互了解、拉近彼此感情。同时，由于国家形象受国家间共享文化知识结构的影响，尽管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难以彻底消除，但彼此之间可以求同存异、寻求并扩大彼此间的文化共识，最终达致彼此身份与利益的相互认同。克制并不是指以牺牲本国利益来迎合他国，而是指拥有实力而不滥用实力，寻求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

而解构战略则是通过提倡对文本进行双重阅读和提供多样化的文本，防御性地、反应式地解构有关中国的负面形象。后殖民主义论述揭示：任何知识都掺杂了主观成分并蕴含着霸权，而大批处于弱势、边缘的国家只能任由强者代替它们来表述其观念、建构其形象。对他者的建构和想象，在当代国际事务中不仅是权力的工具，同时也是权力本身。一国形象就是外部他者对该国突出特征的话语言说和话语建构，就是一个有关该国的文本。谁掌握话语的言说权和文本的书写权，谁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别国塑造成它所希望的样子。一系列有关中国的“非人权”及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正是这种强势话语言说和文本书写的结果。针对这些有关中国的丑化、歪曲、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误解，中国的态度不应是盲目地反唇相讥，也有意识地制造和言说一个敌对的他国形象；相反，积极诉诸于平等地位的对话，则更有助于构筑和谐的国家间关系，增进世界对中国的真实了解。在此基础上，中国应注意运用双重文本阅读战略，既批判性地吸收西方话语言说中某些合理性、进步性的东西，积极完善自我，又要充分揭露这些歪曲、误读背后所隐藏的历史

^① [美]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杨歧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106 页。

偏见、文化差异和非理性的政治宣泄,通过向国际社会提供多种解释文本来解构外部强国的“话语霸权”,消解中国形象中的负面因素,重构中国的良好形象。

同时,改善和提升中国形象还应谨防两种错误倾向:

其一,“自我证实的预言”。建构主义认为,当一种国际规范或集体记忆被假定、预言将呈现何种状态、将向何种方向发展时,由于有关国家有可能按照“预言的逻辑”进行相似的话语实践和外交互动,结果被预言的东西往往变成现实。^①国家形象在很多情况下其实就是由无数自我证实的预言组成的文化结构。这些预言往往既不科学又不真实,但一旦被大多数人相信并付诸实践就会变成现实。

比如,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对相互形象的“妖魔化”,在很大程度上,两国领导人的话语误导及其恶性互动难辞其咎。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曾认为,战后初期的美苏对抗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没有把和平的真实意图告诉斯大林,斯大林误解了美国一系列行动的意图,并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美苏两国在各自的话语体系中建构了对方的“邪恶帝国形象”,结果恶性反复,以致酿成冷战。^②

国际关系中的相互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自己制造出来的。诚如约瑟夫·奈所言:“如果你把他看作一个敌人,他就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敌人。”^③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中应力避以牙还牙,针锋相对,毫不妥协,陷入“自我证实的预言”式的敌对“认同陷阱”中,而应及时沟通,求同存异,扩大共识。

其二,“沉默的螺旋”。“沉默的螺旋”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人们在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时,如果遇到强势话语的阻遏,即使自己不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这样,意见在一方的沉默会造成在另一方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大,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直至最终一方的声音被淹没在强势话语中。

同样的现象也多见于国家形象的建构过程中。其情形大致有二:一种情况是一个国家长期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几乎同外界没什么交往,对外界的形象评判或无动于衷,或默然处之,任凭外界对其形象进行言说建构;另一种情况则与之相反,一个国家完全融入国际社会,有着强烈的自我表达意愿和追逐国家荣誉的强烈动机,但由于受制于本国的信息传播能力,其声音经常被淹没在大国的强势舆论中,久而久之,丧失反抗意志,任凭别国塑造本国形象。“沉默的螺旋”理论表明,一国的国家形象如果不被自我表达,就必然被他者所表达。80年代以前,中国的形象建构基本上属于一种“沉默的螺旋”,由于中国不愿意、也不善于解释自己,中国的国家形象事实上被他者的声音和话语所表达。所幸今天这种情况已发生了根本改观。

① Daya Krishna,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and the Nature of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6, 1977, pp. 1104—1107.

② 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③ 转引自刘靖华:《霸权的兴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88页。